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9

王鴻仁譯

一九一八年

(停頒)

一九一九年

(瑞士) 卡爾·史比德勒

(Carl Spitteler)

卡爾·史比德勒不僅是頭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士人，同時也是僅有的一位。雖然詩人及小說家赫塞(Hermann Hesse)也得過獎(一九四六年)，不過赫氏是德國人，於獲獎前不久才入瑞士籍——因此他的獲獎應當歸功德國。當代瑞士文壇最偉

大的法文作家赫繆(Charles-Ferdinand Ramuz)並未獲獎。赫繆氏早已作古(一九四七年去世)——他生前曾數度被提名，不過始終沒有「上榜」。雖然小小的瑞士只得過一次文學獎，可是却得過不少科學獎，而且，至少有三位瑞士公民獲得頭幾屆的和

平獎：其中包括國際紅十字會的創始人，亨利·杜南（Henri Dunant）。

早在歐戰爆發之前瑞典學院便已接到推薦史比德勒的信函。諾貝爾委員會對史氏也一直頗為重視。史氏有兩部傑作，一部為散文，一部為詩體。兩者都是很久以前完成的——前者完成於一八八〇年代，後者完成於二十世紀的最初幾年。它們多少已經為人們所淡忘——因為它們從未與一般讀者接觸過。

一九一二年，諾貝爾委員會首度延請專家撰寫一份評析史氏作品的報告書。這位專家便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文學史講座，華爾堡（Karl Warburg）。華氏那份報告的結論是：史氏充份具備獲獎的資格。他先指出，史氏的敘事詩與荷馬、但丁、亞里奧斯多（Ariosto）的史詩一脈相承。接着，他補充了一句話：「吾人毋須拿他和這些巨匠相比，因為他是否可與他們分庭抗禮，現在猶嫌言之過早。」史氏不僅是瑞士文壇的巨人，同時也是當代德語文學中最偉大的名字之一。瑞士文壇的老宗師哥德弗烈·凱勒（Gottfried Keller）對史氏的原創力殊為歎服，而

這種原創力也逐漸激起國外著名評論家的興趣。華氏的報告書裏頭引述了許多評論家的話，其中有一段是出自法國的糜黑（Maurice Muret）——糜氏不久以前曾在「巴黎評論」上發表了一篇相當讚美史氏的長文。華氏在報告書的結論部份振振有詞地駁斥一位德國教授——梅耶——的論點。梅氏曾寫過一本在德國大學界裏被奉為圭臬的文學史綱。梅氏在那本史綱裏說：尼采和史比德勒俱曾在巴塞爾大學（Basel Univ.）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史比德勒頗受尼采的影響。華爾堡則堅稱事實恰好相反：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在史氏第一部傑作「普羅米修士與愛比米修士」（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完成之後好幾年才出版的，因此，尼采是受史比德勒的影響。

一九二〇年，史氏歡渡他的七十五壽辰。他受到熱烈的祝賀。他的名字在國際文壇上激起相當大的興趣。直到此時，瑞典學院才終於決定要頒獎給他。他的作品具有「廣潤的音域」，又帶有顯著的理想主義的傾向——完全符合諾貝爾遺書的要求。不過，史氏的

獲獎並非十分順利，因為一九一九年的獎金起初也被「保留」了一陣子。雖然他得的是一九一九年的獎，而事實上，他是遲了一年才獲獎的。

史比德勒和挪威小說家哈姆生同時獲獎——哈氏得的是一九二〇年的獎。史氏必定很感激瑞典學院拖了一年才頒獎給他。因為如果他們「準時」頒獎給他，而他又親往斯德哥爾摩領獎的話，他會碰上一個極為難堪的場面。一九一九年的諾貝爾得獎人當中有一位非常不受歡迎的人物，那便是化學獎得主佛利茲·哈勃（Fritz Haber）。哈勃是一個德國的大學教授，同時又是毒氣的發明人。他的獲獎當然有其道理，不過大戰剛一結束就頒獎給一個發明殺人武器的科學家，這未免太不尋常、太令人震驚了。這件事情激起所有協約國家的公憤，特別是法國。由於這個原因，駐斯德哥爾摩的使節團拒絕列席那年的頒獎典禮。

瑞典王室碰巧有事，所以也沒有出席。瑞典國王古斯塔佛士六世（Gustavus Adolphus VI）的第一任妻子，亦即英王愛德華七世的侄女，瑪格麗特公主恰在此時去世。巧事往往都碰在一起，還有件事情也頗值得一提：那年的頒獎典禮是在夏天舉行的。那是第

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日期為六月一日，而非諾貝爾先生的忌辰，十二月十日。這件事是在瑞典與論界的壓力下造成的。由於十二月十日正值雨雪紛飛的嚴寒季節，對那些不遠千里而來的得獎人及新聞記者而言都是十分不宜，因此瑞典報界一致認為頒獎日應該向前移，好讓那些貴賓們看一看瑞典氣候最宜人的季節，讓他們見識見識晝夜難分、黃昏與破曉溶合為一的奇景（註：此語是指高緯地帶的永晝現象）。

史比德勒碰到不少對手，其中包括舉世聞名的丹麥文學評論家及史家布蘭德。一九一六年的得獎人海登斯坦以同等的熱忱推薦史氏以及芬蘭的小說泰斗，尤哈尼·阿賀。英國的高爾斯華綏、波蘭的雷蒙特也參加角逐——這兩個人後來也先後得獎。競選名單上還包括一位維也納的詩人及戲劇家，霍夫曼斯達（Hugo von Hofmannsthal）。

由於史比德勒毫無國際聲望可言，所以瑞典報界對這位博學的老先生的獲獎表現得相當冷淡。當時保守派報紙（Svenska Dagbladet）的文學評論家奧斯特林（Anders Österling）對這個現象頗為不

滿，他說：「卡爾·史比德勒不僅是一位原創性的天才、一位思想縝密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是一位可敬的智者。嚴格言之，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符合得獎的條件。」

一九二一年

(法國) 安那托爾·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亞勒弗烈·諾貝爾於一八九六年在義大利去世。一九二一年恰逢這位大慈善家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人們總是喜歡利用「週年」來檢討一下過去。因此，一九二一年頒獎典禮揭幕時，諾貝爾基金會會長的致辭也就頗帶有一種「回顧」的意味。當時基金會的會長爲厄普沙拉大學的文學史權威，修克教授。修氏爲一代碩儒，他那篇嚴肅的講辭中充滿了雄偉的意象，比起舊約聖經的先知毫不遜色。修氏所提的問題爲：基金會執行諾貝爾先生的遺志，成績究竟如何？

「哎！」他評論道，「我們對此問題的解答必然

。這位得獎人的詩從未爲通俗性及易讀性所破壞。在詩的領域中，他確實是一個沒有國土的國王，因此學院此一抉擇應當極能令人心服。」

很令人氣餒。諾貝爾先生的目標在今天看來似乎要比以往更爲遙遠。我們的力量微弱無比，不足爲世界謀和平。我們今日所處的悲慘境遇，只有歷史上最黯淡的時刻差可比擬。就是樂觀主義者也會承認：本世紀的文明乃是構築在一個火山口。這座火山目前雖然寧靜，却可能隨時爆發而噴出混亂之岩漿與烈焰。今天的世界若不是在作死前的掙扎，就是在忍受分娩的痛苦——究竟爲何者，我們無法斷言。我們唯一能瞭解者乃是人性的焦慮呼號。」

舊日的歐洲已不復存在。赫赫不可一世的德、奧、俄三大帝國如今俱已從政治的地圖上消失了。流落

異域的王公貴族們熱烈地討論着列寧及蘇維埃統治下的「謎般的俄國」。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國崩潰了，新興的巴爾幹小國如雨後春筍紛紛獨立。德皇威廉二世雖出亡荷蘭的杜恩（Doorn），却仍野心勃勃，虎視眈眈的監視着風雨飄搖的新政權——威瑪（Weimar）共和政府。德國，這個貧窮的戰敗國被凡爾賽條約壓得透不過氣來。經濟蕭條日趨嚴重，恍如惡夢。在這塊殘垣斷瓦、滿目瘡痍的土地上，一種「受難德國」的神話正在迅速地蔓延着。這個新世紀所承受的實在是太多太多，遠非故亞勒弗烈·諾貝爾的理想主義哲學所能夢想得到。

一九二一年的頒獎典禮是諾貝爾頒獎史上最令人難以忘懷的一次——其原因頗為特殊。和往常一樣，這年仍以文學獎最引人注目，而這屆的得獎人乃是一位真正的文壇宗師，其獲獎資格絕對不容置疑。許多年來，這項鉅獎一直落入一些地域性作家的手中。這些得獎人俱為北歐及中立國家的作家，毫無國際聲望可言。因此他們的獲獎也就引起諸多的爭議。現在，文學獎終於又落入了具有偉大傳統，同時又人才濟濟

的法國文壇！更引人注意的是，這位得獎人宣佈他將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以前從沒有一位法國得獎人到瑞典來參加典禮。普里東得獎時已經六十歲，米斯特拉爾七十，兩人俱以年邁為辭，謝絕了瑞典學院的邀請。而安那托爾·法朗士雖已年近八旬，却不畏顛簸之苦，即將前來瑞典參加頒獎典禮。

此次典禮之所以能獲得空前的成功，乃是瑞典學院長期「失誤」的結果。安那托爾·法朗士曾經是最早向瑞典學院推薦候選人的作家之一。他自己也曾數度被提名。可是瑞典學院對於法氏保薦摯友布蘭德及別人保薦法氏本人的信函，始終不加聞問。他於一九〇四年首度為伯希洛所提名。學院首度審理他的候選資格乃是根據一份由倫敦大學（U. of Lund）某位拉丁語系文學教授所執筆之審查報告——那位教授以翻譯但丁及塞萬提斯（註：「唐·吉珂德」的作者）聞名。

法朗士於一九一〇及一九一一年再度為赫爾甫所推薦，不過仍舊遭到無比激烈的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西爾維斯志·龐納德」的世界被戰火摧

毀了(註)——在那種時刻中誰也沒有時間及空間去構築「享樂主義者的天堂」。

一九二一年參加角逐的候選人共有十八位，其中包括蕭伯納、威爾斯(H. G. Wells)、葉慈、柏格森及德蕾達。在這種高手雲集的情況下，法朗士並不顯得很突出。候選人當中有三分之一強是由瑞典人推薦的，而這些瑞典人又多半是學院的院士。法朗士參加角逐也有瑞典人做後盾：三個最著名的拉丁語系文學教授聯名支持他。此外，修克教授也全力擁護他——這是一件衆所周知的事情。修氏以前也曾支持過這個法國作家，不過一直沒有成功。

當學院正在推行表決會議時，修克教授挺身而出，爲法朗士說話，可是却用錯了一個形容詞。他說：法朗士是一個「打破常規」(licentious)的作家

(註) 西爾維斯·龐納德爲法朗士名作「龐納德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的主角，爲一個享樂主義者。

修氏的話剛一出口，一位從一九〇〇年起便被選入學院的老院士——一位八四高齡、相貌威武的主教——立即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他痛斥修氏的論點：「打破常規」和理想主義的諾貝爾獎是水火不容的兩樣東西。在這個緊要的關頭，修氏表現得異常鎮定。修氏蓄着一撮白髮，儼然有宰相之風，令人不覺想起法朗士筆下的夸納方丈(Abbé Coignard)。他婉言請求那位宗教界的同仁「表現一點點基督徒的愛心」。他懇請院士們以宗教的慈懷、以容忍與寬濶的心胸來接納這位「迷失在交通頻繁的文學大道上的弟兄」。修氏這席話終於奏效，於是這年的獎金遂落入法國之手。

那個日子終於來到。安那托爾·法朗士不理會醫生的警告，從法國啓程。同行的有他的妻子、他的出版商卡爾曼列維(Gaston Calmann-Lévy)以及他的外孫。這是一次頗具意義的遠征，全世界的報紙都在密切注意其動態。「插圖」雜誌特地派出一名攝影記者加入這個行列。

這位年高德劭的旅客並非一路保持心情愉快。這

小隊人馬取道柏林首途薩斯尼茨 (Sassnitz) ——他們將在薩港搭船前往瑞典。當他們抵達波羅地海時，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唯獨這位大作家悶悶不樂。他用顫抖的聲音喊道：「我曾經遇過一條怪魚。每次我去看他，他就說：『啊，陸地！陸地！我喜歡陸地。』你們這些人就跟那條魚同樣瘋。」

當他發現波羅地海的對岸乃是一片遼闊無際的冰封大地時，他心中悵鬱依然。「我來這個雪地幹什麼？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我待得下——法國、希臘和義大利！」一個十二月的早晨，法朗士一行浩浩蕩蕩地抵達斯德哥爾摩。這位畏寒的得獎人渾身上下裹着皮裘、毛毯、圍巾，以及許多臨時湊合的毛織品。那天斯德哥爾摩的天氣破例放晴。許多人在碼頭迎接他們，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為風度翩翩的瑞典首相布蘭汀 (Karl Hjalmar Branting)。布氏是個社會民主黨員，一位熱心歐洲事務的人士，同時又是國際聯盟最出色的代表之一。他親自出來迎接，這對法朗士而言確實是一項莫大的榮耀——然而這只不過是一連串榮耀當中的第一個而已。最高的榮耀當然是頒獎典禮。這年的頒獎儀式在音樂學院的演奏廳裏舉行。

有人指責法朗士在別人致辭時打盹。其實這是一樁誤會。後來曾有人問起他這件事情，他回答道：「沒這回事——那時我不是在打瞌睡——那時他們正在談我。雖然他們講的我一句也聽不懂（按：法朗士不懂瑞典語），可是爲了要表示謙虛，我就把頭垂下來了。」

不過致完辭之後，他就沒有再低着頭了。在頒獎台上，與他比肩而坐的是化學獎得主，來自柏林的渥爾特·諾恩斯志 (Walter Nernst)。瑞典學院的正式紀錄如此報導：

「安那托爾·法朗士向國王手中領過獎之後，做了一件令在場觀禮的每一個人深爲感動的事。當這位高貴的作家回座時，他走到化學獎得主諾恩斯志面前，兩人懇摯地握着手——握了很久很久。一個是法國人——『碩果僅存的文壇耆宿』；一個是德國人——偉大的科學家，客觀知識的代表人。這兩個長期交惡的國家，她們的兩位公民已被一次的握手聯絡起來。這次的握手具有無比深刻的象徵意義。與會的人們都鼓掌起來，每一個人都深深感到：這兩個交戰多年的國家，剛才已經盡釋前嫌，和好如初了。」

一九三二年

(西班牙) 哈辛托·貝納勉特
(Jacinto Benavente)

每年頒獎時瑞典學院總要發佈一段簡短的讚詞，以說明頒獎的理由。根據學院的讚詞，貝納勉特之所以於一九三二年獲獎乃是「由於他以適切之方式延續了西班牙戲劇之燦爛傳統。」

是年與貝氏競爭諾貝爾獎的敵手中有一位是他的同胞——事實上，以「半同胞」稱之亦無不可。那便是加泰隆尼亞(Catalonia)的詩人及戲劇家，吉梅拉(Angel Guimera y Jorge)。吉氏爲巴塞隆納的皇家文藝學院所推薦——該學院自一九〇六年起幾乎每隔一年就提名他一次。

這年兩位捷克作家也參加角逐。第一位是由捷克科學院藝術部所推薦之吉拉賽克(Alois Jirasek)——他寫過一本以波希米亞爲背景的歷史小說。第二位是由波爾諾學院(the Academy of Brno)所推

薦的布瑞濟納(Otokar Brezina)——「一個優秀的詩人，他那些神秘主義的詩章俱爲登峯造極之作。」許多百折不撓的瑞典人和英國人仍然支持偉大的詩人及小說家哈代。自從得獎呼聲最高，然而却始終沒有獲獎的梅茵狄斯與史溫朋相繼謝世之後，八十高齡的哈代已經成爲英國候選人中希望最濃的一位了。

貝納勉特創作了將近百部的戲劇——這些作品在國外也頗爲叫座。可是當貝氏獲獎的消息傳出時，幾乎全世界都爲之愕然——其中自然也摻雜着些許的失望。德國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一家漢堡的大報，「漢堡日報」，刊登了一篇十分讚譽貝氏的文字。這篇文章指出：貝氏不僅是今世最著名、最重要的西班牙戲劇家——一個「西班牙的蕭伯納」——同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一流政治人才」。德國人如此

捧他當然是有原因的。大戰期間，中立國大多對德國沒有好感。可是，就在這時，一種親德的全民運動在西班牙如火如荼的推行着。據說貝氏即是此一運動的領袖，當時極為活躍。甚至有人懷疑他那齣在法蘭克福演出相當成功的戲劇（一九一八年），骨子裏是在頌揚「德國對世界的使命」。

得獎消息發佈時，貝納勉特身在南美。他已經在那兒住了一年，而且非常希望在阿根廷定居下來——因為他的戲劇已經漸漸受到當地觀眾的喜愛了。

貝納勉特沒去斯德哥爾摩參加頒獎典禮。他為什麼沒有出席呢？有兩種可能。第一是因為他知道世界各國的文藝界以及大多數的瑞典記者對於他獲獎一事表現得異常冷淡。第二是因為他怕在斯德哥爾摩受冷落——這是很可能的，因為那年的得獎人當中有兩位舉世聞名的科學巨人：愛因斯坦和包爾（Niels Bohr），而且這兩人都決定親往瑞典領獎。

往事已矣，究竟事情的真相為何，我們也不必去追究了。貝氏生前從未涉足亞勒弗烈·諾貝爾的祖國。他於一九五四年去世，死時相當落寞——因為那時候他幾乎已經完全被人遺忘了。



豐生文學類新書

鳳凰樹文學獎作品選集

32開 二二六頁 定價35元 郵購31元

以為多年來，我們就期待著能匯集同學們的心路結晶，以流汗、醒腦、試圖、以胸中的理想，注入一般活躍的生命，以震醒、非筆墨所能描摹。本輯收錄成文十三篇，小說十篇，樹文學獎三年來得獎作品，計散文十三篇，小說十篇，邁向理想之途的時候了。

廢園

32開 二五五頁 定價35元 郵購31元

廖偉竣著

受作者在「中外文學的「嬰兒」」「紅樓舊事」中，我們已感受作者表現死亡、血、陰晦的美，與他那獨特詭異的風格。現在他更圓熟了，描寫死亡的作品，愈趨成熟。他說：「這是一部描寫死亡的作品，代表一種心理分析。他努力築建死亡上學的架構，挖掘人類成長、一種思想。希望您給予它嚴厲的鑒賞和批評。」

■以上兩書同購僅收60元。

■豐生出版社劃撥帳號34599陳添登戶名

■地址：台南617郵箱。電話：62122號